

高教动态

2017年第5期（总第174期）

江苏大学规划发展处（教育教学研究与评估中心）编

2017年10月30日

<http://gjs.ujs.edu.cn>

责任编辑：尤俊英

★高教新闻

- 最新版高等教育质量“国家报告”出炉……………2
我国首次发布普通高校创新能力监测报告……………2
USNews2018 世界大学排行榜出炉，167 所中国高校上榜……………3
江苏 23 所高校的 105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3

★教育教学

- 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品质评估对“双一流”建设的启示……………4

★高教视点

- 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箭在弦上……………9
博雅教育：博专融合的回归之道……………11
面对高校的种种“吸睛”之举，不妨多一点宽容……………13

★热点评论

- 高校教师兼职改革要从“管好领导”做起……………14
“双一流”内涵式发展强调成果绩效……………15

★改革探索

- 苏州大学搭建“两聚一高”研究平台……………17
山东大学：建立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相适应的薪酬分配体系……………18

编者按：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伴随着“十九大”的胜利召开，高等教育更是收获满满、硕果累累，像高等教育质量“国家报告”出炉、我国首次发布普通高校创新能力监测报告等。随着“双一流”建设名单的出炉，扎根中国大地建设的“双一流”，要重视内涵式发展，遵循教育科学规律推进，扎扎实实以成果绩效赢得认可和荣誉。

本期摘取“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品质评估对“双一流”建设的启示”一文，希望在热闹非凡的各种排行榜中，冷静思索，提升学术品质、加强内涵建设，对提升我校的教学质量，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高教新闻

最新版高等教育质量“国家报告”出炉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10 月 16 日授权人民网正式发布最新版中国高等教育系列质量报告。这是继 2016 年首次发布以来，我国第二次发布高等教育系列质量报告。其中，《中国本科教育质量报告》和《中国民办本科教育质量报告》均为首次发布。

此次发布的系列质量报告，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会同厦门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专家团队联合研制，包括本科教育、工程教育、新建本科和民办本科共 4 本专题报告，主题鲜明，各有侧重。

从 2012 年开始，教育部评估中心着手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研制探索工作。2016 年 4 月，该中心首次发布《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也是世界上首次发布高等教育质量的国家报告。此次系列质量报告的发布，积极回应了社会各界对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本科教育质量的关切，将为政府决策、高校改革、社会监督提供权威的专业化参考。（摘自 人民网 2017-10-16）

我国首次发布普通高校创新能力监测报告

教育部与科技部于 9 日联合发布《中国普通高校创新能力监测报告 2016》，首次对全国近 2000 所普通高校的创新力进行了总体评估监测。《报告》显示，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我国普通高校由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发展，科技创新综合实力快速提高。

《报告》以 2005 年至 2014 年全国普通高校统计数据为基础，结合 2015 年全国普通高校创新调查数据，从高校创新情况、创新人才培养、研发活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学研合作 5 个方面，选取 78 个指标，对全国普通高校创新能力总体状况和基本特征进行监测。《报告》认为，我国普通高校在创新能力建设、创新人才培养、科技成果产出和转化方面的变化尤为明显，数据客观反映出了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摘自 光明日报 2017-10-25）

USNews2018 世界大学排行榜出炉，167 所中国高校上榜

10 月 24 日，USNews 发布 2018 世界大学排行榜，来自全球 74 个国家或地区的 1250 所知名大学入围。今年中国共有 167 所高校入围，位居第二。

USNews2018 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依然位居前三位，和去年保持一致。排名第四到第十的高校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牛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中国内地上榜高校中，清华大学排名全球第 64 位，居内地高校第一。北京大学排名全球第 65 位，居内地高校第二。清华和北大也是仅有的 2 所入围全球前 100 名的中国高校。除清华和北大外，中国内地还有 6 所大学进入全球 200 强，分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值得一提的是，专业排名方面，在计算机专业上，清华大学取代麻省理工成为计算机专业的全球第一。（摘自 青塔网 2017-10-26）

江苏 23 所高校的 105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

据世界著名数据公司 Clarivate Analytics（原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发布最新一期 ESI 数据显示，江苏有 23 所高校的 105 个学科进入 ESI 前 1%，机构数、学科数继续分列全国第一、第二，且连续 38 个月保持这一地位。

江苏 8 个学科进入全球前 100 位，14 个学科进入全国前 10 位。其中，进入全球前 100 位的 8 个学科分别是：南京大学化学、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科学、东南大学工程学、江南大学农业科学、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苏州大学材料科学、南京大学材料科学、中国药科大学药理学与毒理学。江苏有 5 所高校 ESI 排名进入全球前 1000，有 14 所进入全国前 100 强。进入全球前 1000 的分别是：南京大学、苏州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监测报告指出，江苏高校进入 ESI 全球前 1%学科所涵盖的领域还不够广，且主要集中在工程学、化学、材料科学、临床医学等 4 个学科，而在经济学与商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综合交叉学科、空间科学等学科领域，江苏高校学科进入全球前 1%的数字尚为零。江苏具有“绝对领先”优势的学科并不多，无一学科成为国内高校排名第一。（摘自 新华日报 2017-10-30）

★教育教学

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品质评估对“双一流”建设的启示

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都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确保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举措，并纷纷提出有关行动计划，如德国的“卓越计划”、韩国的“BK21工程”、俄罗斯的“联邦创新型大学计划”、日本的“21世纪COE计划”等。近20年来，我国政府相继实施了“211工程”和“985工程”，我国研究型大学与国外研究型大学的差距迅速缩小。

在近年来的“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进入了全球50强；在英国QS教育集团近年来的“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我国大陆都有几十所大学入选全球顶尖学科前400名，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双一流”战略的实施无疑将加速推进我国若干所大学、一批学科步入或者接近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行列，而一些著名的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自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参照。因此，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能在世界顶尖大学排名中占有一席之地，是我国“双一流”重点建设大学的奋斗目标。对此，我们既要看到世界大学排名及其指标体系合理性的一面，发挥其重要的导向作用，同时又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对一所大学是否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判断，更多的是对其学术声望与社会地位的整体评估，而不是对被排行榜所肢解的若干指标的评价。本研究在对世界一流大学排行评估的方法论缺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世界一流大学排行应回归学术品质导向。回归世界一流大学排行的学术品质导向，对我国“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世界一流大学排名的教育影响

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主要是社会中介机构、商业机构的排名，目前有关世界大学排名的机构多达40多个，最为有名的有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USNews世界大学排名和QS世界大学排名等。大学排名是一种审计文化，也是一种国际高等教育的问责运动。合理利用这些排名，大学可以塑造自己拥有高质量或者拥有国际标准的形象，鉴别自己是否属于世界一流大学或者全球顶尖研究型大学，或者是否拥有世界一流的学科专业。

大学排名体制无疑已经影响到了大学的公信力和管理。一个明显的证据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名校马来亚大学，在没有任何真正绩效质量下降的情况下，在200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里下降了80个位次，结果导致了校长的替换和大学的尴尬。世界一流也变成了西方化的同义词，就是向西方看齐，结果是都模仿西方而不是发展自己的特色。排名也影响到政府对资金的分配，在英国和新西兰，基于绩效的资金分配与奖励已经实施。此外，排名还影响了学生的入学选择，大学因此也极力采用排名机构的政策和策略优化自己在排名榜中的位置。

世界大学排名体制把大学引向了一个国际竞争的市场，促进了大学知识生产的个人主义、标准化、商品化和同质化的价值观渗透。①就个人主义而言，排名促使个人之间或者大学之间相互竞争，很多国家的大学学术生活里开始充斥着市场本位的价值观，教师们为争取更高职位而专注于自己的研究，不再花费大量时间去一起研讨，集体空间几乎消失。②标准化是高等教育问责运动的标志，通过单一化的关于大学卓越的质量定义，不同使命与背景条件的大学能够在评估中进行相互比较。为了可以比较，现在的大学排行都过于依赖文献计量学数据，这种排名机构界定的质量也因此主要是指教师们的出版数量和声誉以及机构识别的顶尖刊物，这是典型的研究导向，大学要提升位次也因此主要靠这种研究和出版。即使排名考虑到教学，但为了比较或者绩效政策也主要采用总结性评估而不会考虑形成性评估，更不会考虑环境条件。③商品化与市场竞争有关，标准化有助于商品化，商品化使得知识产品失去内在价值而获得市场价值，教室里的各种教学虽然有内在价值但排名机构没有市场手段来评估，所以评估教师工作就主要是看研究生产力。④标准化和商品化有助于同质化的价值观渗透，目前绝大多数大学排行榜都强调教师的研究生产力，出版影响和引用率，特别是用英语发表的作品更重要，原因是用英语发表的作品国际同行引用率会更高，从而有助于提升排名。由此，大学必须前瞻性地考虑大学的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应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以及对卓越的追求。

二、世界一流大学排行评估的方法论缺陷

当前的各种学科或者学校整体的学术评估结果，尽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的学科实力乃至办学水平，但由于排名方法论的不同，同一所高校在各类排名中的结果并不具有一致性，甚至出现排名结果存在很大矛盾。大多数全球大学排名都受到了方法论不可靠的批评，这些排名缺乏它们声称要服务于客户挑选大学的全面信息，它们过于注重英语语言出版物并依靠定量指标来对机构进行综合评估，它们认为学术同行能没有偏见地通过特定学科知识领域的研究和出版来判断出大学整体的声誉和绩效。大学排名的合法性的确值得反思，一个广泛认同的批评是大学排名顺序会产生“虚假的精确度”，因此大学排名应该更多被看做“噪声”而不是质量的变化，因为任何排名标准的调整就会导致位次的变化，任何一个排名都是一个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主观价值判断，排名中选择的测量手段暗含了对质量的武断界定。即使是判断大学声誉的标准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声誉主要来自于资源，就算学术声誉反映质量特征，评价者也没有足够权威知识来判断那么多大学的质量，他们真正熟悉和了解的大学数量十分有限，更别说判断质量了。

因此，正如世界著名比较教育学家阿特巴赫所作的分析，大学排行评估方法论存在明显缺陷。这些缺陷包括：①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缺失教学评估指标。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认识到了教学的重要性，也设置了若干测量质量的指标，如声誉、师生比、教师博士学位数等，但

问题是这些指标并不足以测量质量本身。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正在做一些测量学生学习结果的努力，在 13 个国家的工程和经济学科测量学生的学习结果。②研究支配了排名，现在的排名基本上是用各种方式来测量研究生生产力。这也是最容易测量且可以比较的大学产品如各种研究基金、出版、诺贝尔奖等，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排行指标变量设计，目前也许是相对较为准确的一个科研测量，不过权重上依然过于重视理工科而相对忽略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学科。③声誉评估的效度有疑问，如英国 QS 声誉调查 40%来自学界，10%来自雇主；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64%的调查来自北美和欧洲。不过，谁真正有这能力和学科知识基础能对数量众多的世界大学的研究声誉进行排名呢？至于教学和服务的声誉排名，那就更没办法了。④排名创设了中心与边缘，大学和学术体系中排名靠前的都是英语语言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它们基于历史原因有更好的能力和资金吸引世界各地的教师和学生，它们有更长的学术自由传统以及竞争文化，它们有更多的英文信息数据库和非正式联系网络。在全球化背景下，如果有足够多的资源和更周密的规划，大学相对容易冲入世界一流行列，比如中国的大学就在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

三、回归世界一流大学排行的学术品质导向

从大学排行的功能看，目标导向至关重要。世界大学评估排行应对大学实现其应有的社会责任、价值观及对卓越的追求，起到引领作用。在评估中，需要思考的是评估排行的共同基石而不是去压制大学使命和培养目标的多样性及个性特色发展，从而不至于使大学在学科和专业发展方面左右折腾而浪费有限的人财物等资源，影响大学自身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但要重新思考、清晰界定大学的战略目标比较困难。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认为，由于高等教育的任务是知识密集型又是知识广博型的，因此很难陈述综合大学和学院的目的，更不必说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了。这种目标的含糊性在 20 世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想澄清目标的人不由得望而生畏。他还举例说，在英国，敏锐的观察家们尽管想忠于现实，但却不得不使用“消除无知”这类含糊的表达来解释高等教育系统的任务；在美国，几十年来，实用主义观察家只能说“教学、研究和服务”目的三位一体，而给教学内容、研究内容和应用服务内容留有无数的余地；日本、加拿大、法国和德国似乎无一国确定了更为清晰的目标。对此，伯顿·克拉克认为：知识是学术系统中人们赖以开展工作的基本材料；教学和研究是制作和操作这种材料的基本活动；这些任务分成许多相互紧密联系但却独立自主的专业；这种任务的划分促使形成一种坡度平坦、联系松散的工作单位结构；这种结构促使控制权分散；最后，目的必然是模糊的，广义概括的目标可以使基层操作部门具体目标合法化。这里，我们看到的“教学、研究和服务”目的三位一体仅仅是各研究型大学的共性目标，但伯顿·克拉克所言的大学职能任务分成许多相互紧密联系但却独立自主的学科专业却并非各大学的共性。

目前的世界大学综合排行的方法论，正是依据大学的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目标这个共性而对研究型大学有了比较的一个基础。对其他大学类型而言则不具备这个共性基础。如美国阿默斯特和斯沃斯莫尔文理学院，他们的本科生教育声誉和质量超过了很多常春藤大学，但由于机构类型不同，这些大学往往不在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另外，现实中各大学的实际学科专业在数量和规模等方面的差异太大，进而各大学的科研任务和社会服务目标差异也相差悬殊，大学排行依然会出现难以比较的方法论缺陷。因为这个差异，偏文科类、偏文理综合类、偏理工类的大学，按照现行的评估排行方法论，即使仅仅依据相对客观的文献计量学去统计各大学的科研，无论总数还是平均数抑或高引用率都难以客观反映各大学的真正办学水平。这个难以比较的大学评估综合排行导向结果是，很多大学为了提升自己的排名位次，应用了“学科优质率”概念，意思是“优质部分数量与总量的比率。大学学科优质率就是一所大学的优质学科数量与学校学科总量的比率，一所大学的学科优质率越高，证明学校学科整体水平越强。提高学科优质率，就需要在增加优质学科数量的同时减少总学科数，或者是优质学科数量增加速度高于学科总量增长速度”。应该说，用这个概念来审视大学的整体学科优秀程度很有价值，问题是提高学科优质率的策略逻辑有待商榷，增加优质学科数量是大学追求的目标，但减少总学科数似乎就有仅仅为了排名而置某些已办的符合社会需求的新兴学科于不顾进而砍掉的消极后果。同时国内现实是，由于现行大学排行偏重文理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很多偏理工的大学在努力发展文科类专业学院，而偏文科类的大学在努力发展理工类专业学院，而偏文理综合性的大学则在努力发展医学院。这在排名需求和社会需求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伦理逻辑悖论。

从教育目的而言，全球大学之间可以真正进行比较的评估排名方法论是大学的学术品质。理解大学的学术品质含义，可以依据以下三个维度：第一，大学的学术品质，意味着大学的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活动围绕学术而展开。诚如伯顿·克拉克所言，知识是学术系统中人们赖以开展工作的基本材料。教学、科研和服务三位一体目的，尽管历经了不同发展阶段，但不可否认的是科学研究是学术研究，教学也是一种师生之间的学术文化互动，至于社会服务更是学术研究和教学学术的社会实践应用。第二，大学的学术品质，是大学学术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综合性素质要求。大学是全体师生的组织集合体，只有大学组织集体具有一定的综合性素质要求，才能履行好大学的三种职能活动。换言之，大学的学术品质要从三大职能实践活动中得到彰显和证明。这种素质彰显和证明，一方面表现为目前大学评估排行中并未全面体现出的绩效指标，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目前大学评估排行中基本未全面体现出的核心竞争力指标，另外还表现为目前大学评估排行中基本未体现出来的质量保障指标。无论如何，我们固然可以依据大学职能把大学的学术品质分为教学学术品质、科研学术品质和社会服务学术品质，但这种分类属于依据活动任务与目的差异的分类，因为教学活动、科研活动或者社会服务活动中可能体现了大学组

织很多相同的学术品质。第三，依据中外大学促进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共性教育目的，以及世界一流大学是全校师生包括管理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可以发现大学的学术品质主要包含 3 个方面的素质要求，它们分别是：①大学的学术伦理道德品质，根据教育的历史与现实，主要表现为师生在三大职能活动中积极践行示范学术伦理道德、遵守学术伦理道德、违背学术伦理道德甚至法律底线三种不同层次的素质，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应当是学术伦理道德的积极践行示范者。2016 年 2 月 25 日宁波市教育局和财政局联合发布了《宁波市高校办学绩效评价办法（试行）》，其中在一级指标里对于“严重影响高校发展和声誉事件”设置了 10 分扣分项目，就是包含着这方面的学术伦理道德品质评价；②大学的学术智能品质，根据大学核心竞争力和教师绩效理论，学术智能品质主要是师生在三大职能活动中体现出的竞争性教学能力素养、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素养。教学能力素养主要体现为教师来源和教学考核的竞争性、学生入学标准的竞争性以及就业竞争能力等方面，主要有国际竞争、国内高竞争、国内中度竞争、国内弱竞争四个基本能力层级；关于科研能力品质，主要有教师获取各种科研项目的竞争能力和科研成果的先进性，借鉴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对其国内高校科研成果评估标准，科研成果的创新性、重要性和精确性有国际领先、国际较高、国际认可、国内认可、国内不认可五种能力层次；关于社会服务能力品质，主要有教师的学术兼职与社会服务效果、学生的社会服务项目及能力等，主要有国际认可、国内认可、不认可三个基本能力层级。③大学的学术健康保障品质，分为大学外部质量保障品质和内部质量保障品质。借鉴企业价值链管理理论，按照大学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活动等教育基本价值链和管理活动辅助价值链的分类，大学的学术健康保障品质直接表现国家与大学为师生提供的政策制度、信息、收入、物质条件等服务的辅助价值链管理能力，最终表现为师生满意度，评估标准上可以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太满意、不满意等 5 个基本层次。

四、学术品质评估对“双一流”建设的启示

任何反映大学或个人学术品质的绩效工作，一定是数量与质量的混合体。问题在于依赖数理统计的定量化学术评估机制和依赖专家智慧或者学术同行判断的定性化学术质量评估机制各有其作用和适用范围，前者更适用于基本办学条件和工作任务量评估，后者更适用于提升学术品质评估，这也是学术界批评过于依赖量化评估但始终无法摒弃的原因。事实上，美国的顶尖大学很重视教学质量的定性评估。其评估方式是由利益相关者进行的全覆盖面的评价，同行之间的评估、高级职员对低级职员的评估、学生对教师的评估等等。这种评估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其结果会对教师的岗位、职称和收入产生直接甚至是严重的影响。评估通常采取无记名问卷调查方式，有时也采取记名但绝对保密的调查方式。美国的顶尖大学关于教学质量的评估，不仅要看教学大纲、学生作业、学生评价，还要看同事和系主任对课堂教学的观察和评论等。

哈佛大学原校长陆登庭曾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有高水平的原创性研究、高水平的教师，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以及充足的办学经费等，这是其共性的一面。同时，每个一流大学也都有自己的特色。建设一流大学是为了适应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都为各自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家提出“双一流”建设的大好机遇面前，一流大学建设首先应当为国家的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一流学科的建设，则既要瞄准世界前沿的学科，争取有所突破，又要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加强对能源、环境、水资源等传统学科的研究，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在工业化过程当中所急需的。因此，一流大学建设，不能完全按照在 Nature、Science 上发表多少文章，作为其是否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衡量标准。如果能坚持主要以大学的定性评估机制为主导来推进学术品质建设，而不是盲目追求“学术 GDP”，大学就会在推进学校整体或学科建设中清楚地看到自身的质量进展和在世界一流大学丛林中的位置。（摘自 中国高教研究 2017 年第 9 期）

★高教视点

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箭在弦上

一直以来，教育界对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存有争论。所谓教育转型，目前相关研究者给予的定义是“教育转型不同于教育变迁、教育变革、教育改革、教育革新等，它是教育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型和教育性质、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本文作者立足江苏，推及全国，认为高等教育发展到当前大众化阶段以及正在到来的普及化阶段，必然要转型。高等教育转型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发展规律起作用的表现，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转变。

转型发展已成为“必然要求”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各类教育普及水平不断提高。以江苏为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1996 年为 7%，2000 年达到 15%，进入大众化阶段，2014 年达到 51%，实现普及化，走过欧美国家六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区域教育现代化达成度大大提高，2015 年江苏教育现代化监测结果显示，全省教育现代化建设综合得分 78.7 分。办学条件显著改善，2015 年全省高校教室面积和实验室实习场所面积均较 2000 年扩大 6 倍，高校占地面积扩大近 5 倍。教育投入总量和生均预算经费稳步增长，“十二五”末，江苏省教育总投入突破 2000 亿元，其中财政性投入达 1819.1 亿元。教育结构更加科学合理，2016 年高中阶段普职结构比例大体相当。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专科、本科、研究生比例为 0.63: 1: 0.15，橄榄型初现，研究生在校生中专业硕士占比为 42.5%。

多年快速发展，教育的发展有目共睹。但正如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教育也应适应教育内外部形势，转入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加强内涵建设为重点的常态运转，由数量增长型转向质量提升型，因此，转型发展成为教育阶段性发展的必然要求。

转型发展要“以问题为导向”

高等教育转型发展，首先要以问题为导向，突出重点。当前教育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特别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有其深层次原因，转型发展必须以这些问题为导向，积极引导高等教育步入以内涵与质量为主旋律的发展轨道。

教育自身发展规律与“经济式”发展教育的矛盾，在普及水平不高、追求大众化阶段，在教育的某些领域、某些方面运用经济式发展方式情有可原，然而到后大众化阶段，则更加需要遵循教育发展自身规律。

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与功利性价值取向的矛盾，功利性教育往往将教育作为经济附属品，政府功利性教育观要为经济社会发展多出人才，家长功利性教育观要分数、要上好大学，要有好的就业。

教育结构调整与现有教育政策的矛盾，以江苏为例，江苏本地以制造业为特征的工业化需要职业技能人才，然而老百姓骨子里仍然希望读普高。在布局结构上，普遍规律是在大城市、经济发达地区办高校，高等教育发展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经济发展薄弱地区又需要高校来提升城市化水平，若向落后地区倾斜，则违背规律。省级统筹与地方冲动的矛盾，突出表现为不少市县往往通过举办或引进高校来带动开发区建设，存在不切实际的盲目办学冲动。

高等教育转型发展还需确立转型战略，明确结构调整主线。笔者认为其主要思路是：稳控规模、优化布局、调优结构、提升水平。即合理确定高等教育适度规模，控制各类高校在校生成规模。在具体操作上，不能简单的做减法，要先做布局调整与结构优化工作。通过对学科专业结构等内部结构优化来控制规模。既要区域优化、行业优化，又要对办学类型优化、办学层次优化。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考虑，有条件支持中心城市根据产业发展与社会建设设置综合性大学。要有计划地调整高教资源，形成分工协作的局面。

需要强调的是，在转型发展中，我们必须立足实际，破解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要立足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实际、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立足社会转型的实际。立足区域不平衡的实际，还要立足学龄人口变化的实际。比如，“十二五”期间，江苏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18~22周岁）呈逐年下降态势。“十三五”期间，全省高中阶段毕业生高考报名人数将稳定在40万人左右。到“十四五”初期呈回升态势，2023年达到46万人左右。因此，“十三五”是教育发展缓冲期，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组合的窗口期，应抓住机遇、不失时机推动教育转型发展。

推进转型发展的对策与措施

一是强化规划意识，建立长效机制。要持之以恒地实施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和“十三五”规划。对各高校实施规划情况开展评估检查，建立长效机制，保障规划的落实。

二是实施分类管理，提高教育质量。国家层面将普通高校分为研究型、应用型、职业技能型三类，德国分为传统型、应用技术型和艺术型。但各地还要根据自身实际，做出分类，比如根据江苏的现状可分为研究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技能技术型和开放型。每一类高校建设中都要有提高办学水平的目标思路、政策措施和项目工程。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要出台分类指导意见，委托第三方制定分类评价方案，开展分类评估。

三是深化体制改革，做大优质资源。总结近 30 年的教育体制改革经验，我们将民办教育作为今后发展最大的红利。要鼓励办高水平的私立大学，试办一批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鼓励独立学院转设为应用型高校。

四是完善各类标准，提高办学水平。建立健全各类学校的基本办学标准，尤其是应用技术大学与综合性大学的标准，除基础教育外，江苏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办学标准总体应当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并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五是强化分级管理，明确各自责任。强化高等教育国家和省两级办学，以省为主。省级统筹应积极运用计划杠杆、院校设置杠杆和政策杠杆，引导各地各部门各高校各按其位，科学发展。统筹兼顾各地基础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保障水平，纠正县市盲目发展高等教育的地方利益冲动偏向。

六是加强指导协调，做到因地制宜。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有各自特点，转型发展不能简单一刀切。要加强引导，坚持试点先行，发挥各类高校在转型发展中的主动性、积极性。

促进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必须根据内涵建设的需要与新的阶段性特点，研究配套发展性的教育政策，在发挥市场调节的同时，采取行政引导与政策杠杆等措施。一方面要面向世界，有全球战略视野，另一方面要总结借鉴江苏等地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样本经验，在中国教育普及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针对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不失时机地将高等教育引入以内涵建设与质量提升的转型发展轨道，深入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摘自 光明日报 2017-10-12）

博雅教育：博专融合的回归之道

狐狸通常知道很多事情——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会有非常多的策略和计谋；但刺猬通常只知道一件大事——遇到攻击时卷起来，就可以保命。

刺猬把所有的挑战和进退维谷的局面压缩成简单的“一元方程”，成专才之代表；而狐狸则主张多元主义，尊重世界万物的多样性以及事物的多维度、多层次，对一切事物都保持好奇，追求不同甚至相互抵触的目标，凝聚了通才之特征。

未来世界多元发展、纵深复杂，未来的人才如何在“刺猬式”的一技之长之基础上，也拥有“狐狸式”的具有转移性的通用能力，既能适者生存，也能更胜一筹？

日前，以“博雅教育：理念与实践”为主题的第三届博雅教育国际研讨会于复旦大学召开，

在国际坐标上，博雅教育“中西合璧”，点燃不一样的“烟火”。

与专业教育融合相生

“教育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时间段，而是一种终身追求和终身学习的过程。”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常务副校长安德鲁·谢楠在谈到博雅教育时强调，博雅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理念及能力。

“学费‘涨’到每年8万元，相当于现在国内普通高校的10倍；入学标准一直卡的很紧，考生必须达到高考第一批次录取分数线，且高考英语成绩必须达到115分。”在如今国内学生就读高校的选择机会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宁波诺丁汉大学的高标准的招生要求与高学费丝毫没有影响学生和家长的择校热度，缘何如此？

“英语剧本是我们自己写的。”该校学生叶越所在的戏剧社在圣诞节大大出了一次风头：《阿拉丁》《美人鱼》和《绿野仙踪》等这些不相干的童话故事用现代的、搞笑的语言串到了一起。这段时间，叶越的重头戏是课堂作业——关于电影《紫色》的3分钟演示，加之其他功课，叶越仍抽出时间筹划另外一个英文短剧的演出。她认为，“这也是一种学习。”

博雅教育，旨在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然而在教育日益功利化的今天，当教育者在本科阶段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专业化教育时，博雅教育或多或少沦为专业教育的辅助手段，其所扮演的知识启蒙角色也渐隐渐弱。如何使博雅教育重归教育初心，与专业教育融合共生促进人才更好发展？

“怎么培养杰出人才？”当问及钱学森先生时，他给予的建议是：学工科的、学理科的，也要学习一点文学艺术，很多灵感就是在文学艺术的修养中产生的。“公共写作课就是要让学生学会怎么把行话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给行外人听。”安德鲁·谢楠介绍，韦尔斯利女子学院高年级的学生必修“公共写作课”，并邀请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等各院系的教师共同进行该课程的教学。然而，课程结束，并不表示教学的完结。课程结束后，学生被分成若干小组，承担并尝试研究和解决某个特定的国际问题，由此使学生真正实现跨学科式的“博”雅教育。2005年，复旦大学就正式成立复旦学院以开展通识教育，后又提出2+X改革，学生在大二专业分流之后，仍不被放到专业里培养，再用一年时间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两年之后学生在第一次专业分流的基础上还可以二次选择，之后再继续进行专业教育。

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非简单相揉或是叠加在一起，而是在彼此中互相影响、相互作用。因此，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通，还将不仅限于课程内容上的交融，二者更要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

促进学生多维度成长

“如何大量地开出高质量的研讨式、交互式的课程，更好地匹配博雅教育的教育目标？”困

于传统的灌输式的国内教育方式，一位参会的老师不禁忧心忡忡。

“我们学校每周三下午常设三大系列讲座。一是科技讲座，邀请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在内的科学家为学生分享他们的科学之路；二是外交官系列讲座，邀请各国外交官进校与学生交流互动；三是艺术家进校园。”澳门科技大学校长刘良介绍并分析道，“博雅教育如果光凭几个专业教师，恐怕很难达到目标。为此，澳门科技大学更是鼓励和倡导校内非通识教育科目的教师亦在专业教育之中融合博雅教育思想。”

而在香港中文大学，要求教师能清楚地认识到，在开发慕课时，除了传播知识外，还要加强学生的读写能力，引导学生通过对话和辩论等方式发现真理。“中国学生大多比较沉默、较为内向，这种害羞、沉默的文化其实就是从课堂开始的。”芝加哥大学常务副校长艾瑞克·艾萨克斯认为，如果在课堂上教师鼓励对话，学生就会愿意互相分享和交流，进而带有批判性思维认知和看待问题，才能培养会问问题的人才，而非只会答问题的学生。

当前，为推进及深化博雅教育，一批批“书院制”等全新管理模式上线：不同学科的学生混居、教师和学生共同学习和生活，通过实践活动锻炼社会能力、通过科研项目提高学术水平，与学院相比，其更致力于促进学生在认知、情感、社会性等方面的多维度成长。

但缺乏能长期深入地与学生交流和分享的教师，却是博雅教育难以广泛推行的软肋之一。如何扩充专业的博雅教育师资队伍，如何开拓专业教师博雅教学技能，如何在上述这种关系密切、互动交流的师生社区中实现教学相长，探索之路还将漫漫。

进入人类“问题”中心

高等教育大众化成果越来越显现，诸多大学将资源投入到追求国际一流的目标上。同时，高等教育也越来越呈现国际化和跨国化教育趋势，为博雅教育的未来发展带来更大空间，却也面对着更大的压力。对于未来人才的培养，博雅教育还将有哪些作为？

“深入推进博雅教育需要我们进一步创新理念，探索更加符合国情和学校发展特点的教育模式和有效举措：一是要更加注重推进科学知识教育、人文素养教育和实践能力教育的融合发展，二是要注重提高课程建设水平，三是要注重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徐青森指出。

在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的政治学系，有一门很受学生喜爱的课程——“水政策以及水问题，中国与美国的差异”。该课程涉及几个国家面临的水污染及水资源匮乏、湿地保护及城市暴雨收集管理等问题。在课程设置上，学生完成课堂教学后，还会到一些国家进行为期3周的实地考察。如参观中国三峡大坝，用10天时间在重庆大学了解重庆的城市规划及环境保护。

“通过这样的体验式学习，学生能获得第一手资料并亲眼目睹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进而会主动开展比较和跨学科的研究。”斯沃斯莫尔学院副校长托马斯·史蒂芬森介绍，这种内嵌式

的海外学习体验也延伸到了和平与冲突等课程中，如研究巴基斯坦、以色列历史和人口因素所造成的冲突问题等。

“‘做人第一，修业第二’是博雅教育的核心要素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始终强调。博雅教育不仅是把学生培养成人才，更要把学生塑造成负责的公民。（摘自：中国教育报 2017-10-17）

面对高校的种种“吸睛”之举，不妨多一点宽容

日前，东部某著名高校发布了“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规定称，在国内权威媒体及其“两微一端”上发表的优秀文章或网文，根据发布平台与传播水平，可认定为国内权威、一级、核心等学术期刊论文，纳入晋升评聘和评奖评优。

办法一出台，立即引起各方热议。不少文章用“10万+可算学术论文”为题，认为“点击量”可与学术论文的学术价值等量齐观。反对者认为，这容易导致内容的偷工减料、学者的心浮气躁以及学术本身的退步。但也有许多支持叫好者认为，在大众注意力向新媒体转移的当下，改变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改革创新之举，勇气可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近，西部一高校与企业共建的“网红学院”开课运行，有近20名学生在此学习网络直播技巧，以期成为未来的全职网红主播。此事经媒体报道后，也旋即引起激烈争论。有教育专家认为，“网红”作为一种新兴现象，没有相关的学科内涵，高校开设“网红学院”更是不严肃、不理性的行为。但也有不少网友提出相反意见，认为大学不能总守着老专业不放，培养学生也应该与时俱进，学校的大胆创新值得点赞。

对立的观点与态度，其实正体现着社会对高校在两个维度上的要求和期望。事实上，大学要保持中国特色、竞争世界一流，解决困扰多年的“钱学森之问”，与时代接轨、不断改革创新不可或缺，而静心学术研究、秉承大学气质更是不容忽视。

大学精神需要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高校应是一个开放包容、能够容纳新事物的地方，也应是一个介入时代变化、引领时代潮流的地方。如果一味抱古守旧、抱残守缺，那么大学就变成了“老古董”，钻进了“象牙塔”，很难有所创新，也很难赢得社会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网文的被认可，还是网红学科的试水，其实都是高校适应互联网时代做出的自我调整，只要在考核尺度、学术标准等方面不降低水准，社会也无须急于否定。事实上，当下众多创新创业类课程的开设、各种“慕课”与网络授课的兴起，也都是大学不断探索与时代相容的产物。

但另一方面，静心为学、坚持真理的学术使命，是大学精神赖以生存的根基。毕竟，经营大学不同于经营企业，“10万+”不能代替学术评价的标准，“网红”就业也不能代表教书育人的成果。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常人眼中，大学是文化科学的重地，

是大师云集之所，理应低调深沉，而不是人云亦云、轻浮躁动。所以，在大学的发展中，尝试新鲜事物无可厚非，但坚守学术与育人的初心更加重要。尤其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学术研究的“十年磨一剑”、基础学科的“甘坐冷板凳”，更为难能可贵。

一流大学需有一流气质。注重学术传统与适应时代需求是一流气质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也是大学不断提升品质的必由之路。而面对高校的种种“吸睛”之举，大众也不妨多给点时间、多一点宽容，让大学在不断探索中走出自己的道路。（摘自 新华网 2017-10-23）

★ 热点评论

高校教师兼职改革要从“管好领导”做起

要让改革的好处真正落实到教师与科研人员身上，就少不了在改革中对行政权力做好约束，这是教育领域各项改革的应有之义。

日前，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鼓励科研人员公益性兼职，同时允许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这一《意见》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是细化了对高校、科研机构领导的兼职管理，消除社会舆论对高校、科研机构领导利用职权去兼职谋求个人利益的质疑。

去年，国家出台意见允许高校教师、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兼职兼薪时，就有舆论担心，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领导会不会利用职权，以兼职为名进行利益输送，同时影响普通教师、科研人员的兼职空间。这次安徽出台的《意见》，按照利益回避原则，对领导兼职作出了比较详细、具有操作性的规定，对防范因兼职兼薪出现的教育腐败或学术腐败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对其他省市也有示范效应。

《意见》规定，高校、科研机构正职领导不得在企业兼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根据工作需要，经批准可在本单位出资的企业或参与合作举办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兼职，兼职数量一般不超过1个，个人不得在兼职单位领取薪酬；高校、科研机构所属的院、系、所及内设机构领导人员，经批准可在企业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兼职，兼职数量应适当控制，个人按照有关规定在兼职单位获得的报酬，应当全额上缴本单位，由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奖励。根据上述规定，高校、科研机构的所有行政领导人员的兼职行为都有明确规范。这些规定排除了领导与兼职问题的利益关联，这就使得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制定有关兼职政策，对教师、科研人员兼职进行管理时，能够免于受到领导个人利益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在努力推进高校和科研院所现代治理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离，使行政权不能再掌控或者干预教育和学术事务的管理与决策。要真正将这项改革落到实处，不能仅靠“让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这样的表面功夫，而需要让担任行政

职务的领导，根据行政职权的大小和利益回避原则，全方位地“避嫌”。在教育和学术评奖中，也有必要实行回避制度，控制领导获奖的名额和比例。

简单来说，改革的核心要点，就是要防止“行政权力通吃”，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防止行政权力过度膨胀，并促进行政权力为教育和学术工作做好服务。国家放松对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兼职兼薪的限制，主要就是为了激发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的活力，增加知识价值。要让改革的好处真正落实到教师与科研人员身上，就少不了在改革中对行政权力做好约束，这是教育领域各项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摘自 搜狐新闻 2016-10-18）

“双一流”内涵式发展强调成果绩效

国家“双一流”建设突出绩效导向，明确在公平竞争中体现扶优扶强扶特，动态调整支持力度，增强建设的有效性。国家以绩效为导向支持“双一流”建设的方针政策，代表了广大高校和全社会共同心声，大家希望看到国家的财政投入被切实、高效地使用，高校“双一流”建设收到预期成效，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得到更大满足。换言之，高校如何更新理念、精心布局、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强实力、结出硕果，这些更是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点。

高校重视内涵式发展，用实际成果交出建设“双一流”的满意答卷，这在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背景下极具现实意义：

一是坚守国家“双一流”建设工程目标。长期以来，高校和学界把争取到国家教育工程看作是对学校的认可、荣誉及获得更多的国家财政投入。事实上，国家设立教育工程，初衷、目标都是希望入选高校意识到肩负的责任和要拿出实际的建设成果。回顾过往，进入“211”“985”工程的高校都获得国家高额财政补贴，而且身份固化、利益固化，客观上也存在社会上对高校“211”“985”身份的关注超过了对建设成效关注的现象。现在强调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内涵式发展，就是要从根本上扭转对国家教育工程的“占到位子就能得利”的不当观念。

二是促使高校制定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不可否认，在国家教育项目的申报和管理中存在一定的重申报、轻验收现象，高校中也存在对建设项目的预期成果论证较为粗糙、随意的问题。一旦学校申报的项目获批，有的学校就认为万事大吉了，至于后期建设、成果验收等环节，往往敷衍了事。把重心落到成果上，严格对预设目标进行评审，将有助于高校充分重视“双一流”建设方案的论证和实施。高校加强内涵建设，说到底，就是要保证高校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建设上，拿出实际成果对国家财政投入负责，对自己的承诺负责。

三是为高校专心治学减少不必要的活动。国家相关文件多次明确政府简政放权，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过多的外部行政会议、庆典活动等，会耗费学校领导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使其“无法分身”于学校内部学术、行政管理事务，同时过多的行政检查、汇报等事务也会令学校干部

与教师疲于招架，这些都会影响高校办学治学应有的沉静和专注。为此，要最大限度地给予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治学的时间和空间，静候高校亮出“双一流”建设成果。政府部门和全社会把注意力放到高校建设成果上，这是最简洁、明了和高效的管理和监督手段。

四是提供让“黑马”脱颖而出的公平竞争环境。随着国力强盛和教育投入增加，中国建设成若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早晚的事。应该说，今天财政问题已不再是影响中国“双一流”建设的绝对条件，而且各路社会资金也还在不断投向教育领域，由此，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无疑是中国“双一流”建设早日实现的必然土壤。如果说，“双一流”建设名单可以由政府发布，但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一定要凭业绩和成果来说话。所以，要鼓励“双一流”建设名单外的高校参与竞争，亮出成绩，这样的氛围有助于选拔出中国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竞争力的“白马”和“黑马”高校。

五是吸引社会各界监督和支持“双一流”建设。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教育，实现一流教育强国梦想更是世代仁人志士生生不息的追求，今天国家提出建设“双一流”重大战略，正是国强民强体现，高校有必要向社会公开建设成果，接受社会大众监督和评议，获得更广泛建设资源。就以人才培养为例，学校应公布在学生培养方面的经费投入，预设的培养目标及相应的课程，每门课程都应明确能学到什么知识和技能、毕业后能做些什么等关键问题，也要分析实际取得的课程效果和在校学生及毕业生的实际状况等。高校亮出建设成果，对高校“双一流”内涵式建设最有效的自我问责和外部监督机制。

扎根中国大地建设“双一流”，重视高校内涵式发展，既有助于调动高校全体师生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有助于“双一流”建设遵循教育科学规律推进，扎扎实实以成果绩效赢得认可和荣誉。（摘自 中国教育报 2017-10-30）

★改革探索

苏州大学搭建“两聚一高”研究平台

比较 2015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关注外贸的人士会注意到，2016 年、2017 年的报告中没有再提及进出口增长率要求。一个已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 30 年的经济指标，为什么会在这两年淡化？这缘于苏州大学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龚震曾写过的一篇文章——《建议淡化外贸增长目标》。

一个地方大学牵头的研究平台为何在近年来亮点频出？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负责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进华说：“聚焦社会治理，聚力协同创新，以高水平研究中心促进多方共赢，我们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呼应和落实江苏的‘两聚一高’建设。”

2014年成立的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以苏州大学为牵头单位，汇聚了包括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在内的众多高校、院所及政府机构，以苏州大学原有的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等为协同创新平台，开展跨部门、跨学科、跨领域协同研究。3年来，协同创新中心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研究，发表了150多篇核心期刊论文。

如何充分调动校内外各平台、团队、专家的积极性？为此，协同创新中心实行“双跨单聘、单聘为主”“专兼结合、以专为主”的人事管理方式，鼓励研究人员开展跨学科研究。正是在这一机制的运作下，在苏州海关工作的龚震才能以“双跨”研究员的身份进入协同创新中心开展研究工作。

作为一个架构于高校的协同创新平台，人才培养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协同创新中心通过培育新兴学科、产生标志性成果的方式，提升研究能力；通过培养复合型、创新型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优化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结构。（摘自：中国教育报 2017-10-15）

山东大学：建立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相适应的薪酬分配体系

10月17日上午，山东大学第二届齐鲁青年论坛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召开，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在会上发言说，山东大学建校以来，始终秉承“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的办学宗旨，努力为各种类型的人才提供最自由、最充分的成长空间，形成了“不拘成规、唯才是举”的优良传统，培植了“识才、惜才、容才、爱才、护才”的优秀文化基因。

樊丽明介绍说，当前，山东大学已顺利进入国家确定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行列，根据山东大学自身学科优势和国家发展需求，明确了要重点建设的学科领域，着力打造冲击世界一流的学科高峰。近年来，山东大学在队伍建设方面进行一系列探索。2014年，山东大学专门成立了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独立建制的人才工作办公室，专门负责学校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山东大学还实施了《山东大学杰出人才体系建设方案》，按照“顶尖人才—杰出人才—青年骨干—年轻后备”四个层次布局学校各类全职人才项目，将人才待遇真正和学术水平与贡献对应起来，同时根据人才体系中不同项目的岗位目标实行合同管理，打破了人才项目待遇的终身制。

山东大学还将工作业绩、服务质量、实际贡献等纳入人才考核评价体系。鼓励协同创新和团队合作，完善团队考核和团队负责人考核制度，探索建立教学科研人员业绩“多边认可”制度。山东大学将实施薪酬制度改革，提升教师收入水平，尤其是提高杰出人才的薪酬收入水平，建立起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相适应的、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薪酬分配体系。不断改善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为教师开展学术研究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支持和精准到位的政策指导；下大力气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做好子女入学、住房补贴、医疗服务、社会保险等惠民工作。（摘自 江苏高等教育网 2016-10-19）